

西方面临来自内部的政治冲击

● 阎学通



法国的罢工示威风潮,使人联想起1994年年底以来西方国家发生的一系列剧烈社会动荡事件。1995年4月23日美国国内恐怖主义分子爆炸了在俄克拉何马城的联邦政府大厦,死百人伤400余人。10月3日警方指控有

双命案的黑人明星辛普森被宣判无罪释放,引起社会轩然大波,黑人与白人的种族对立加剧。在仇视白人的极端主义分子法拉汉的发起下,10月16日40万黑人聚集华盛顿举行了“百万人游行”的集会,号召黑人自尊自强。11月政府与国会在预算问题上各不相让,预算危机使联邦政府80万工作人员停工回家一个星期。日本社会更是经历了二战以来少有的社会动荡。1995年3—4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和横滨地铁站投毒,使至少300多人中毒。10月21日,8.5万冲绳市民举行群众集会,抗议美军强奸日本女学生的暴行和日本政府的软弱立场。如此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是1960年后所罕见的。1994年12月6日,在意大利素有“廉洁运动旗帜”之称的米兰检察官安东尼奥·迪彼得罗罗愤辞职后,一连数天,米兰、罗马、都灵、那不勒斯、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巴勒莫等许多城市的民众举行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人们涌向米兰检察院声援迪彼得罗。

分裂主义,恐怖主义,街头暴力,警民冲突,反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等政治现象,曾长期被西方视为是发展中国的政治疾病。冷战后这些政治疾病在西方国家广泛地蔓延开来,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禁使人们要问,原因何在?

冷战后人们的一个共识是,东西方矛盾的弱化使原有的种族、宗教、文化、阶级矛盾突显起来。这一结果在发展中国家表现为内战增多、政权更迭,在西方国家则表现为社会矛盾突起、政局多变。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分歧、种族歧视、贫富不均、劳资对立等矛盾被东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所掩盖了。冷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减少,西方人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日益淡漠,其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大。示威游行规模之大足以表明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程度。

冷战后经济区域化与民族主义矛盾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社会内部产生新的分裂。经济区域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是开放市场与保护民族工业的矛盾加

大。在西方则出现排外与经济一体化矛盾的问题。冷战后地区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迅速,为了保护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西方政府加速区域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的愿望增强。为了扩大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西方政府有必要减少区域内的保护政策,这与冷战后西方反移民的排外主义情绪对立起来。在法国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有1/5的人支持了反移民的极右派人物。法《世界报》认为,法国的罢工实际上是一场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运动。

冷战后西方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直接导致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冷战的结束使原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饱受经济衰退的苦难,同样西方在冷战后也承受了经济不景气的痛苦。1991—1995年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有1.8%。其主要国家中日本最低约为1.3%。美国中下层人民的收入不断减少,1993年与1991年比,一个美国典型家庭的购买力下降了1400美元。西方国家高失业问题长期化,1995年失业率在7%左右,欧盟15国的失业率高达10.7%,法国最高约为11.7%。收入不断减少严重地降低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更换政府的要求也自然增长了。

社会改革伤害了一些人的具体利益,改革措施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弹。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政治和经济的改革,由于改革的措施不同,结果也大不一样。冷战的结束,使得西方国家也面临了一个如何进行社会改革以适应新世界的问题。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改革措施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无论他们在具体政策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基本可分为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两种。法国朱佩政府的改革政策是典型的激进主义,所以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危机。而英国梅杰政府和德国科尔政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渐进主义改革政策,所以社会矛盾没有激化。美国克林顿政府所进行的社会改革是说了不少实现的不多,所以社会动荡程度介于法英之间。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对西方国家形成的政治冲击是客观存在的,要想避免这种政治冲击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进行社会改革,以适应新的世界发展潮流,特别是在社会改革中有效地平衡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矛盾的问题。如果西方政府能维持平衡则有可能避免出现大的社会危机,否则将难免发生政局严重动荡和极右势力上台的结果。如果西方右翼力量执政,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则有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这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将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